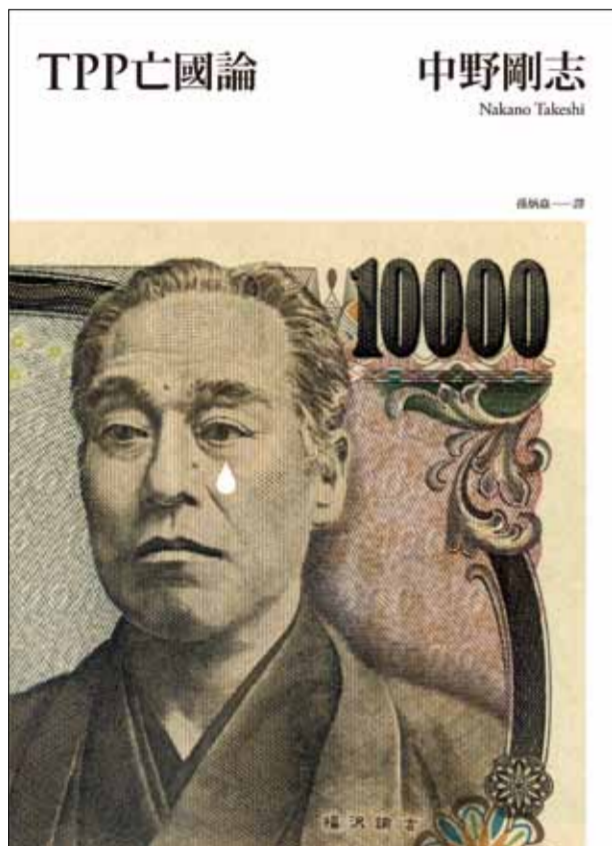


正視TPP的衝擊

——《TPP亡國論》譯序

◎孫炳焱



本書原作者中野剛志博士是目前日本經濟論壇的新星、年輕公務員及學者新秀。一九七一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一九九一年進入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養學科就讀，一九九六年畢業即在中央部會的經濟產業省（前通商產業省）擔任公務員，後來帶職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研究政治思想史，專門研習經濟民主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經濟理論並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回國

後不久，由經產省借調至京都大學研究院工學研究科擔任助教，翌年升為助理（準）教授，著作（含共著）有十餘冊，其中引起學界及輿論界注意的有《國力論——經濟國家主義的系譜》、《自由貿易的圈套——覺醒的保護主義》以及本書《TPP亡國論》。留英期間，曾獲取第一屆英國民族學會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rize」。

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 Robert Gilpin 介紹經濟思想有三大主流，一、自由主義，二、馬克思主義，三、就是中野氏所專研的經濟民主主義，這是淵源於十八世紀德國 F. List (1789-1846) 歷史學派的國民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時德國為對抗英國自由貿易的理論工具，主張國家應保護幼稚產業及維持農工平衡發展，重視國家的獨立及國益優先，對國家個別的歷史、語言、特殊文明、風俗習慣等的國民精神文明應予尊重並傳承。反對英國 A. Smith 的自由經濟及世界主義與個人主義，認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應在國家，經濟政策、產業政策應以國益為基礎而規劃，強調國家應培養產生財富的生產力，這個理論本來是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的戰略思想，曾為當時美國社會所歡迎，到了二十一世紀又強調國家安全保障的自立自主，國民自決，國家獨立，以及戰略資源，例如，水、能源、農業等的確保、領土的完整等等，演變成「國際化，全球化，自由化」挫折後的新經濟思維與理論，歷史輪迴，令人驚訝。

二〇一〇年秋，當時日本菅直人總理宣佈，檢討參加TPP協商，普遍獲得輿論、財界、政界，特別是執政黨、學界的支持，一致認為撤銷非關稅壁壘，擴大貿易

才能挽救日本經濟「失落二十年」的困境。中野氏發揮年輕人的「蠻勇」衝勁，以及個人的人格特質，靠一支筆寫文章，用一張嘴出席媒體，展開反對TPP論戰，引領論壇風雲，論戰的基礎理論就是前述的經濟民主主義。論戰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指出主張國際化，自由化的美國本身，仍然以國益優先規劃各種經濟戰略，其他國家豈能含糊隨著自由化，全球化的口號而起舞，缺乏國益優先的思考戰略而洞開門戶。TPP正是美國為輸出倍增，設計的世界戰略之一環，所以日本是否參加TPP，應該慎謀熟慮，思考自己的國益，小心應對。中野氏的努力，竟改變了一邊倒的輿論風潮，在國會議員中，有超黨派的三百二十一名議員表態反對參加TPP，讓弱勢產業，特別是農業界人士受到無比的鼓舞。但是中野氏仍然認為「政府推動，輿論支持，背後又有美國撐腰」的政策，只靠學界的良心予以翻轉的例子，是戰後日本史中未曾有過的事，所以呼籲日本國民認真思考，慎重決策，勇敢表態。《TPP亡國論》一書出版以來，二年間暢銷三十萬餘冊，就經濟專門的書來說，可謂異數，引起社會對TPP問題的關心，可想而知。

比起日本與韓國，臺灣政治經濟情勢，夾在美中大二大國之間，所處環境尤有千百倍的困難，現在臺灣只有「能不能參加」的問題，根本沒有「要不要參加」的考量餘地，正因如此，本書才更突顯它的參考價值。京都大學益田敏英教授在二〇〇八年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時，提到做研究，特別用「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句話，來說明做學問或領導人做判斷，都應該多聽聽不同意見，勿受偏見矇蔽，失去正確判斷的機會。過去臺灣參加國際組織，一向是只要能參加，就很慶幸，至於參加後的得失，很少做徹底的評估，我們固然需要審度時勢，做適當的妥協，但不宜盲目的做決定，臺灣只有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一言堂，對於其他主義，則大都不予理會，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是少見的，雖然臺日間，政經客觀條件差異懸殊，本書仍然提供給我們許多不同面相及思量的寶貴意見，值得參考。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也面臨一些心理上的障礙及疑慮，例如1.釣魚臺的主權及沿岸領海漁權問題，站在臺灣的觀點，還是有相當不同的感受。2.經濟民主主義伴隨的政治國家主義，是否會重演軍事強權主義，這些都

令人難掩心中的不安。3.書中言及俄國總統梅德維傑夫訪問日本北方島嶼，與日本政府對釣魚島沿海的中國漁船紛爭事件，處理不當有關，但似乎缺乏直接的論證，足以說明二者關連，4.通貨緊縮的原因，究竟是(1)預測未來物價下跌，所以偏好貨幣而惜買，或是(2)一般所說，單純是購買力不足所引起的，似乎尚無實證研究可下定論，5.參加TPP以後，日本商品開拓海外市場的潛在商機，由於日貨商譽一向甚佳，具有相當競爭力，作者是否過於低估？6.作者認為TPP是美國的陰謀，企圖藉TPP的締結而進入日本農業市場，以擴大對日本的農產品輸出，譯者認為以日本官僚體制之嚴密精明，是否那麼容易就範？美國是否會如此輕易造次，也令人不無疑問，7.戰後日本，就是在資源輸入，製品輸出的自由貿易體制下復興經濟，可以說是貿易自由化的受害者，如今要主張保護主義，恐怕亦有所不便，8.TPP以自由化無例外為參加條件，所以一旦參加，像全民健保制度不符合美國保險公司及醫療資本家的利益，可能以非關稅壁壘提訴而被迫，廢止官辦的醫療社會福利制度，另外，對外國人的僱用及居留的限制亦可能以非關稅壁壘提訴而改變，這方面的著墨不多等等，均有待深入探討。不過全書論述理路清晰，條理分明，字裡行間充滿對國家社會的關心與熱情，引導讀者思考，掀起話題，就是一大功勞。

譯者特別期待我國公務機關人士，能看到日本年輕公務員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工夫，把國事視為志業，內化為自己的問題，再全心投入想為國家的困境找出路，這樣的精神，實在值得學習。

本書譯出的催生者，是譯者久年老友，日本福岡大學經濟學系的施昭雄名譽教授，他與中野氏稔知，於去年年底撮合了二地的合作，在翻譯過程，涉及日本近代史及文言文（文語體），承蒙他的指教甚多，另外東京大學農學博士戎野真夫先生多次以電話為譯者解釋日本俚語及農業問題，二位的幫忙使翻譯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藉此表達由衷的謝意，至於文責，一切在譯者，是無庸贅言的。誤謬之處也在所難免，尚祈讀者不吝指教。又好友曹永洋君熱心義助校正，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慨允出版這種不與當代主流唱和的經濟論著之譯書，譯者也銘感於心，一併致謝。

不屈的受難和奮爭

——讀《上帝是紅色的》

◎康正果

廖亦武是當代中國最著名的禁書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受禁，是因為多年來他通過一系列訪談記錄深入勘探中國的底層社會，對中共當局竭力掩蓋的社會陰暗面作出了持續不斷的如實報道。他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兩次在國內出版，兩次被禁，直到2002年才由台灣麥田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全集。該書出版後在海外的中文讀者群中引起廣泛的興趣，特別是其英譯本（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2008年在美国出版，書中講述的苦難、殘暴和腐敗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關注。廖亦武不只其書被禁止在國內出版，其人亦被禁止出境，近年來他十多次受邀參加國際文學節和書展，均因當局的阻撓和刁難而未能成行。

廖亦武其人及其書越受壓受禁，其聲譽在中共的禁網圈之外便影響越大，而他為突破那個禁網所進行的採訪勘探也隨之範圍越廣。繼《中國底層訪談錄》之後，他至今已推出兩卷本《中國冤案錄》、《中國上訪村》、《最後的地主》和《地震瘋人院》多種訪談專輯，其採訪報導面遠超出早期的社會邊緣人遭遇，而擴展到反映維權上訪者的怨訴和抗議，公佈老地主及其子弟早為世人遺忘的苦難經歷，乃至及時報導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期間被官方媒體隱瞞的種種真相。

從事此類採訪，廖亦武所碰到的麻煩不只是不准出書和出境，平日還常遭受公安人員的騷擾，或被傳喚到當地派出所審問申斥，或住處突遭搜查，被抄走資料和電腦，種種粗暴的待遇，成為他多年來的家常便飯。

2004年12月，只因他採訪了法輪功練功者，差一點被破門而入的便衣警察抓走。那天晚上，廖亦武機警地跳窗而去，倉皇逃到成都，長期躲到了雲南。正是這一次深入苗、彝等少數民族居住的邊遠山區，廖亦武有緣結識基督徒孫醫生，隨後在孫的帶領下進入基督教的教民世界，在他勘探底層的訪談錄中又開拓出一個新的領域。

現在，廖本人編定的中文版《上帝是紅色的》也即將面世，對有興趣瞭解和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及現狀的讀者，這的確是一份特別珍貴的資料。

其實，早在隨同孫醫生踏上艱辛的基督徒尋訪途之前的1998年7月，在一次與北京地下教會組織者徐永海的相遇中，廖亦武已初步瞭解到基督教傳播在中國受到的打壓。眾所周知，反對帝國主義，不但是中共奪權鬥爭中所打的旗號，也是他們掌權後在全民範圍內鼓動敵意的主要目標。自1949年中共建國，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內各基督教派別，一律都被與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的文化侵略聯繫在一起，從此基督徒在中國遭遇到自該教傳入東土以來最嚴重的迫害。首先，外國傳教士被一批批驅逐出境，留下來的中國教民則遭遇更慘，他們或被殘殺和判刑，或受到毆打批鬥，或被迫放棄信仰，他們的《聖經》被撕毀焚燒，大量的教產也被沒收充公，在整個的毛澤東時代，前此的宗教活動基本上陷於停頓狀態。為粉飾虛假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掌控基督教群體，在現行宗教政策的嚴格限

制下，政府強行建立「三自愛國教會」。這個官辦教會不但割斷中國天主教教會與梵蒂岡的聯繫，而且由此安插進黨在基督教內部的代理人，致使基督教在中國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

雲南地處邊陲，與英法殖民的東南亞國家接壤，早在十九世紀，歐美傳教士就在那裡開展傳教活動，至1949年，在苗、彝、白各少數民族居住區，洋教士主持的教會已擁有了大量的信徒。他們辦醫院，收養孤兒，為振興地方教育也作出不少貢獻，總而言之，在那一帶貧窮落後的地區，確實起到過移風易俗和淨化社會的良好作用。這些虔誠而富有愛心的洋教士就是當地教民擁戴的「遠東牧羊人」。在他們被作為帝國主義的文化特務趕走之後，當地的不少教民因受牽連而遭到種種迫害，廖亦武這部訪談錄向我們講述的就是他們中個別受害者及其家人血淋淋的故事。倖存的天主教徒張茂恩家中世代信主，他大哥張潤恩身為神職人員，為地方上辦過很多好事，在民眾中頗有聲望。然而，中共的建國徹底顛倒了傳統社會固有的價值，他那些「解放」前奉主的榮耀，到了「解放」後竟全成為反黨反人民的罪行。黨和政府及其唆使的積極分子所進行的革命就是要破壞舊有的價值，因此，他們首先要從舊社會有影響的人物身上開刀，他們就是要打倒善人和好人，要消滅上帝的選民，要造成撒旦橫行天下的局面。於是張潤恩在群眾批鬥後被長期關押，在折磨得皮包骨頭失去人形的情况下被槍殺在村外的河岸上。不信神的共產黨是無所畏懼，因而也毫無人性的，他們殺了人還不准家屬收屍，直到十個月後，才准許家屬從河邊的淤泥中刨出屍體，重新埋葬。就在重新埋葬時，家人發現了一個奇蹟，張潤恩那時已骨肉腐爛，但他臨死前揣在懷裡的《聖經》卻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另一個新教牧師王志明，就因他身為牧師，文革中便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而慘遭槍殺。他兒子王子勝也連累坐了多年的監獄。王志明受害的事跡後來傳至西方，在1998年，他的英名入祠英國西敏寺，成為二十世紀偉大的殉教烈士。

我們讀過的廖亦武訪談錄已經很多了，如果說他筆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僅以其個人的不幸令人深感情和萬般無奈，進而凸顯出共產專制下種種社會之怪現狀，那麼這部基督徒訪談錄則除了控訴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對教民的殘酷迫害以外，更能讓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讀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難者堅貞不屈的人格，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昇，在極度的震撼後領會到撫慰心靈的光。就拿孫醫生來說，他醫術超群，本來在大城市享有高職高薪，但在信主後卻斷然放棄了優越的待遇，隻身到雲南山區，一年到頭風裡來雨裡去，奔波在崎嶇的山路上為窮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傷的同時向他們傳佈了教義。孫醫生為什麼要做這樣自討苦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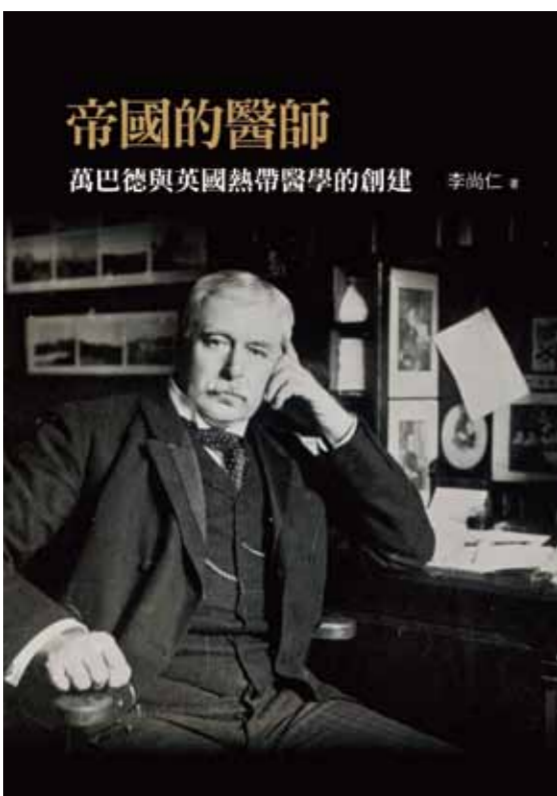


（文接二版）

帝國的醫師

◎李尚仁

為什麼要寫一本關於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的專書?乍看之下,問題的答案應該很簡單:在西方醫學史上,萬巴德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被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The Father of Tropical Medicine),顧名思義,自是建立這門專科的關鍵性人物,單憑這點就值得他作傳。更何況,這位蘇格蘭醫師的生平多采多姿,在家鄉亞伯丁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遠赴重洋到臺灣打狗展開其海外醫學事業。萬巴德是英國人,卻任職於中國海關,成為清政府的僱員。他以熱帶疾病研究的成就在歷史留名,卻未曾在非洲、印度等西方人眼中典型的熱帶地區



從事醫學工作,而在廈門取得其最重要的科學發現。萬巴德之後不只成為香港的名醫,其卓越的醫術和聲望更使他與許多重要歷史人物交會:李鴻章是他的病人,孫中山則是他的學生。回到倫敦之後,萬巴德除了繼續投入熱帶疾病的研究與醫學教育工作之外,更協助英國政府擬定熱帶殖民地的醫療政策,並因其成就受封為爵士。如此豐富而精采的醫學生涯,更值得大書特書。不過,就嚴謹的史學觀點而言,所謂某學科「創建者」的說法,經常是對歷史的扭曲。一門學科的建立和一種新知識的發展,必然涉及許多人的作為與努力;其成功也有賴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因素的輻輳。此外,撇開類似「國父」這類帶有神話色彩的簡化稱呼,從嚴謹的科學史與醫學史角度考察萬巴德的醫學生涯,也會發現其醫療事業與科學研究成果,不也和當代醫學與科學相關領域的知識內容與研究方向有著複雜而密切的關係,其對熱帶醫學這門專科日後深遠的影響也需要嚴謹的檢視與評價。

萬巴德的絲蟲病研究和瘧疾研究改變了寄生蟲學的發展方向,為日後昏睡病、瘧疾以及黃熱病等其他重要熱帶疾病的研究奠定重要基礎。早前西方醫學界大多認為象皮病是瘧氣引起的疾病,到十九世紀中才有人猜測此一疾病可能和寄生蟲感染有關。萬巴德的研究不只支持象皮病是絲蟲(filarial)感染所引起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還發現蚊子是班氏絲蟲的中間宿主(intermediate host),在象皮病傳染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是醫學界首度發現昆蟲可以是人類寄生蟲疾病傳播過程的一環,為昆蟲病媒(insect-vector)概念的提出跨出重大一步。之後,萬巴德又提出蚊子可能是瘧原蟲宿主的假說,並於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間和在印度服役的英國軍醫官羅斯(Ronald Ross, 1857-1932)合作研究,證明蚊子是瘧原蟲的宿主且瘧疾是經由蚊子叮咬而傳播。此一發現解開瘧疾傳播方式之謎,也提出完整的病媒觀念,羅斯更因而榮獲諾貝爾醫學獎。長久以來,瘧疾一直是造成熱帶地區白人患病與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被視為是歐洲殖民、開發熱帶地區的最大阻力。西方醫學向來認為瘧疾是熱帶

瘧氣所引起的疾病,瘧原蟲和蚊子病媒的發現帶來一場病理學和流行病學的大變革。然而這場革命不是萬巴德和羅斯所獨力推動,法國與義大利瘧疾學者至少也有同等重大的研究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萬巴德的絲蟲研究所提供的模型以及他提出的蚊子瘧疾理論(Mosquito-Malaria Theory),對此一研究潮流的最後關鍵階段產生重要引領作用。

除了醫學研究的卓越表現外,萬巴德在醫學政策和醫學教育的領域也展現出高明手腕,其創設的體制與推動的殖民醫學走向,在日後留下深遠影響。他與學弟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1926)在香港創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是今日香港大學的前身,也是西方醫學教育在華人世界紮根的重要先驅。萬巴德自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二年擔任英國殖民地醫務顧問(Medical Adviser to the Colonial Office),為熱帶殖民地醫療問題提供專家意見,協助打造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醫學政策和防疫措施。透過和英國政府的關係,萬巴德在殖民地長錢伯倫(Joseph Chamberlain)鼎力支持下於一八九九年創立倫敦熱帶醫學學校(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該校為前往熱帶殖民地服務的醫療官員和醫療傳教士提供專業課程訓練,替熱帶醫學的專科建制奠定重要基礎,也成為歐美頂尖的熱帶醫學研究機構。萬巴德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熱帶疾病》(Tropical Diseases)則成為此一新興醫學專科的重要著作,可說在熱帶地區工作的醫師必備的參考書。此書日後多次修訂再版,為紀念萬巴德的成就至今仍以其名出版。

(文接一版)

由於萬巴德在現代醫學史上佔有如此重要地位,關於他的研究自然不少。有關他的生平至少已有兩本內容豐富、經常為人引用的傳記。其中,菲利浦·萬巴爾(Philip H. Manson-Bahr)與阿爾考克(Alfred Alcock)合著的《萬巴德爵士的生平與事業》,對其一生經歷敘述最為詳盡,且納入許多寶貴的一手資料,是所有研究萬巴德及英國熱帶醫學史的學者至今仍必須參考的重要著作。然而,這本由親人與同事所寫的傳記,在史觀與分析上不免有所偏頗。該書把重點放在突顯與表揚偉大科學家的功業,卻未能探討其研究的學術脈絡、社會與政治環境,甚至偶爾忽略或貶低其他研究者的貢獻。這些以個別科學家為中心的英雄史觀所遺漏之面向,是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崛起的醫學社會史的研究焦點。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在一系列開創性的論文中,探討贊助熱帶醫學研究的不同團體和英國殖民政策,如何形塑英國熱帶醫學在研究發現與預防措施等方面的獨特取向。法利(John Farley)的重要論文則詳述寄生蟲學與細菌學分道揚鑣的歷史,並以相當篇幅分析萬巴德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道格拉斯·漢斯(Douglas M. Haynes)的《帝國醫學》是近年醫學社會史的典型著作,著重從醫學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角度分析萬

下來。張印仙從來不向革命群眾低頭,改革開放後上面落實宗教政策,她擔上九十歲的孀孀在鄉政府門外示威抗爭近三十天,最終爭回了他們的教產。拒參加「三自教會」的袁相忱寧願將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脅利誘低頭讓步,直到關押二十多年後釋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嚴密的監視下還堅持辦家庭教會。因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國的失散靈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對比廖亦武其他訪談錄中眾多受害者的經歷,《上帝是紅色的》中的人物為讀者開啓了一個新的向度,他們不再是無望地訴說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諷世道的荒誕,在中共當政下的悲慘世界中,他們活得有志氣有目標,透過那鋪天蓋地的平庸,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經歷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嘆他們那源於信仰的堅強。訪談錄中還穿插了幾個教民們盛大聚會的場面,儘管那山野間的聚會環境很簡陋,場地很簡陋,那群蠅亂飛的聖餐禮也讓人感到不太衛生,但與會者的熱情始終是高昂的,祈禱的聲音是虔誠的。由此可見,中共六十年來的迫害、打壓和限制並沒有把固有的價值完全顛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勢的今日,被破壞的秩序正在恢復常態,受傷的心靈也在隨之康復,信仰的力量是不滅的和無窮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謂浩浩蕩蕩的巨流,任什麼強權也休想阻擋。

理由:自然史研究在西方淵源久遠,可回溯至古希臘時代。廣義的自然史包含所有對自然事物的描述、分類與歷史探究,其研究涵括今日生物學的研究範圍,也包含地質學、礦物學乃至人類學等學科的主要範疇。在寄生蟲學成為一門專科之前,對寄生蟲的研究原本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再則,自然史研究生物的生長、繁殖、分布,以及生物與生物、生物與環境的關係。寄生蟲學研究在十九世紀興起,上述議題也是寄生蟲研究的主要關切,因此研究方法與概念也就主要來自當代自然史學說。在目前相關文獻中,關於自然史與寄生蟲學的關係,只有法國學者德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的黃熱病研究曾提到地理分布(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和適應(adaptation)的概念對萬巴德絲蟲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德拉波特對這點討論相當簡略,基本上他的焦點是在古巴進行的黃熱病研究,對萬巴德的討論只是要指出古巴醫師芬萊(Carlos Finlay, 1833-1915)對黃熱病傳播方式的理解,受益於萬巴德絲蟲研究以及羅斯的瘧疾研究,萬巴德的研究本身並不是德拉波特關注的焦點。本書則探究寄生蟲學這門學科的歷史淵源,詳細分析當代自然史的重要概念,尤其英國自然史研究對於「完美適應」(perfect adaptation)這個概念的重視與討論、十九世紀興起的超驗自然史(transcendental natural history)對於物種分布與解剖結構之法則的探討,以及生命史研究所提出世代交替(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s)理論與對生物個體性(organic individuality)的討論,對萬巴德寄生蟲疾病研究的重要性。

為收集這些苦難中抗爭的故事,廖亦武追蹤孫生平的足跡,在同樣崎嶇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雖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尋訪之旅無形中已撒上了朝聖(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訪談錄也譜入了讚美詩的樂音。全書的二十多個故事分別來自神父、牧師、天主教修女、聖公會長老、地下教會佈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憶毛澤東時代殘暴的迫害,有的陳述地下教會在打壓下不斷發展的現狀,每一個故事都以受訪者生動的口述令人如臨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實傳達了基督教群體爭信自由的心聲,同時也弘揚了他們歷盡苦難卻信心彌堅的感人精神。

(文接一版)

是個好東西,是你們能夠拿出來,和匆匆過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從內心愛你們,但是天不早了,每個人都得獨自上路。」

探訪之旅畢竟使廖亦武與今日中國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會不會信教,那純粹是他個人的事情,但基督徒爭信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對他的巨大鼓舞則是毫無疑問的。作為一個獨立作家,寫作乃是廖亦武終生的事業,不管中共當局怎樣禁止他的作品在國內流通,不管他們採取什麼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給他的日常生活帶來麻煩,他還是會照樣堅持寫作,會繼續開拓他採訪的領域,會把當局竭力掩蓋的事實報導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門業已打開,從港台到歐美,到處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讀者,更有更多外文譯本的市場。今日的世界需要報導真實的文字,因為只有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瞭解到中國社會的真實,才有助於改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處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鎖真實保存下去的中共政權,必將隨著越來越多的真實情況大白於天下而難以繼續作偽,最終徹底失去信譽。至少,隨著這本《上帝是紅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將會在更大的範圍內暴露出它一貫的謊言欺騙,而國內那些爭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會因此而贏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敘述風格,每一篇訪談錄都附有風趣的引言,間或有補充說明的後記。在這些夾敘夾議的短文中,作為局外人的敘述者,初入貧窮落後的少數民族山寨,他那個來自城市的漢族身分,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視角,難免使得他對眼前的異樣風俗,耳中的陌生語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隨著賓主的對話漸入佳境,再加上山民們的好客和敦厚的樂觀態度最終使他深受感染,對他們的世界,他遂獲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採訪結束時他從心裡發出感慨說:「由於我還不是教內弟兄,在場的人……挨次勸導我消除顧慮,受召歸主。質樸的中國底層人啊!我理解信仰

我的創作觀和文學啟蒙

◎邱振瑞

先談談我的創作觀和文學啟蒙。

或許出於性格所致,向來那些與時代社會嚴重脫節、風花雪月和自戀虛無的藝文,始終與我扞格不入。相反地,西方優秀的寫實主義風格的小說,尤以深刻批判見長的作品,很自然地成為我渴閱狂讀的文本。從雨果、巴爾扎克、左拉、莫泊桑、狄更斯、契訶夫、巴斯特納克、索忍尼辛、褚威格、雷馬克、海因里希·伯爾、亨里希·曼等作品,提供給我豐饒的文學養份,讓我見識到小說的偉大與深奧。而它們恰恰是我從小立志成為小說家的推手,沒有它們我不可能走得下去。

有些時候,我也經常追問自己,文學領域何其廣泛,為何唯獨對小說創作如此痴迷?它具有重大的意義嗎?對我而言,彷彿沒透過如瀑布飛瀉而下的文字沖刷,沒有經歷與筆下人物的生死與共,沒有同喜同悲的擁抱,沒有深入社會底層的關懷,沒有碰觸靈魂深處的震顫,我便得不到再生的力量,找不到自我圓滿的契機,更無法抵達自我救贖的彼岸似的。後來,隨著對小說創作的體悟,我確信了一個道理:小說正是我的修行之路,沒有它的妙法導引,我的文學生命終將是缺憾的。是的,就因為這個證悟,它是我邁入中年以後最重要的功課與試煉。



《來信》是我的第二本小說集。

從時間上算來,它距離我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菩薩有難》,匆匆已過五年。這段期間以來,我精神歷程的轉折頗大。在我的書寫策略和風格上,同樣出現很大變化,我自覺有幾分努力而為,但其實是順乎而然,就這麼寫下來。換句話說,我多半聽從「小說之神」的指示,每次起筆都在等待祂玄妙的附身;我依照故事的內容開啓與結束,依循人物的想法說話,依照時序和情節的發展描摹敘意而已。儘管如此,在文中仍看得出我努力展現的敘述美學的企圖與痕跡,哪怕只有分毫畢現,但那終究代表著自我思想的堅持。本書共收錄了六篇中短篇小說,每篇都灌注著時代與生活的印記,如果那些文字能夠撥動讀者的心弦,自是作者竣稿以後的雙重喜悅,因為在書稿完成的同時,我也完成了自我意義的追尋了。

我相信,成書總是各種因緣聚合使然。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首先我要感謝允晨出版社發行人志峰兄的抬愛與賞識,以及詩人何郡、辜振豐老師的支持與鼓勵,特別是明目書社的賴顯邦先生,他深刻明晰的思想敘說,總是帶給我震撼與啟迪,使我對掌握小說的本質更從容自在,在此用申謝忱。

巴德生平事業。漢斯特別強調英國醫學院畢業生過剩所帶來的專業出路與利益問題,以及帝國競爭和民族主義刺激下英國與其他歐洲強權的科學競爭,如何形塑萬巴德的醫學事業發展。

上述醫學社會史著作的研究視野廣度與分析深度都遠超一般對「偉大醫師」的歷史敘述,讓我們看到熱帶醫學知識的建構與殖民政策、不同贊助者團體的利益考量、醫學社群內部利益競逐乃至個別醫學人物事業策略的複雜關聯。然而,這些研究尚未窮盡萬巴德醫學生涯所涉及的重要議題和豐富的歷史意涵。首先,這些研究焦點多放在大英帝國的脈絡,不過萬巴德大半的醫學生涯是在中國度過,在廈門的絲蟲病研究帶來他畢生最重要的科學發現。上述著作對萬巴德在中國的醫療與研究活動著墨有限,未能詳細考察他的工作方式與環境,也未能深入探討相關的社會、文化脈絡。就日前殖民醫學史強調對殖民地醫療活動進行細賦探討的研究取向而言,這些研究的焦點幾乎完全集中在萬巴德和歐洲中心的關係,雖有其重要洞見,但不可諱言其視野仍有所侷限。相較於此,萬巴德在中國的醫學活動會是本書的重要主軸。萬巴德所服務中國海關醫療勤務的特色、他對中國衛生環境與疾病問題的觀察與認識、其醫療活動的特色、和中國病人的互動、與醫療勤務同僚以及中國助手的關係等,是本書討論的重點。

本書另一個探討的焦點,則是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概念、研究方法與技術對萬巴德寄生蟲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熱帶醫學與自然史的關係有充分的歷史

理由:自然史研究在西方淵源久遠,可回溯至古希臘時代。廣義的自然史包含所有對自然事物的描述、分類與歷史探究,其研究涵括今日生物學的研究範圍,也包含地質學、礦物學乃至人類學等學科的主要範疇。在寄生蟲學成為一門專科之前,對寄生蟲的研究原本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再則,自然史研究生物的生長、繁殖、分布,以及生物與生物、生物與環境的關係。寄生蟲學研究在十九世紀興起,上述議題也是寄生蟲研究的主要關切,因此研究方法與概念也就主要來自當代自然史學說。在目前相關文獻中,關於自然史與寄生蟲學的關係,只有法國學者德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的黃熱病研究曾提到地理分布(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和適應(adaptation)的概念對萬巴德絲蟲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德拉波特對這點討論相當簡略,基本上他的焦點是在古巴進行的黃熱病研究,對萬巴德的討論只是要指出古巴醫師芬萊(Carlos Finlay, 1833-1915)對黃熱病傳播方式的理解,受益於萬巴德絲蟲研究以及羅斯的瘧疾研究,萬巴德的研究本身並不是德拉波特關注的焦點。本書則探究寄生蟲學這門學科的歷史淵源,詳細分析當代自然史的重要概念,尤其英國自然史研究對於「完美適應」(perfect adaptation)這個概念的重視與討論、十九世紀興起的超驗自然史(transcendental natural history)對於物種分布與解剖結構之法則的探討,以及生命史研究所提出世代交替(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s)理論與對生物個體性(organic individuality)的討論,對萬巴德寄生蟲疾病研究的重要性。

為收集這些苦難中抗爭的故事,廖亦武追蹤孫生平的足跡,在同樣崎嶇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雖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尋訪之旅無形中已撒上了朝聖(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訪談錄也譜入了讚美詩的樂音。全書的二十多個故事分別來自神父、牧師、天主教修女、聖公會長老、地下教會佈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憶毛澤東時代殘暴的迫害,有的陳述地下教會在打壓下不斷發展的現狀,每一個故事都以受訪者生動的口述令人如臨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實傳達了基督教群體爭信自由的心聲,同時也弘揚了他們歷盡苦難卻信心彌堅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敘述風格,每一篇訪談錄都附有風趣的引言,間或有補充說明的後記。在這些夾敘夾議的短文中,作為局外人的敘述者,初入貧窮落後的少數民族山寨,他那個來自城市的漢族身分,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視角,難免使得他對眼前的異樣風俗,耳中的陌生語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隨著賓主的對話漸入佳境,再加上山民們的好客和敦厚的樂觀態度最終使他深受感染,對他們的世界,他遂獲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採訪結束時他從心裡發出感慨說:「由於我還不是教內弟兄,在場的人……挨次勸導我消除顧慮,受召歸主。質樸的中國底層人啊!我理解信仰



零下一歲開始刷牙

書後私語

◎不二牙醫診所院長 陳維斌

說實在的，寫這本書並沒有經過長期計畫，就像我做的一些事情一樣，都是想到了就馬上付諸實行，沒有去刻意去顧慮到底會不會有成果。所以寫這本書的目的很單純，就是覺得台灣的社會已經進步到需要有一些廣泛的牙科預防醫學的知識，而傳播這些很容易付諸實行的知識必須有人來起個頭。

我長期住在日本，所以這些知識都是長期在日本所累積的，其中除了一小部份和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以外，絕大多數都是一般性的常識。日本是一個很刻板的社會，只要有一條軌道在眼前，基本上大家就會沿著這條軌道往前走。很少會有人去懷疑這條軌道是誰制定的，是怎麼來的。尤其牽涉到醫學這種專門知識的領域，只要具有權威性的組織有所主張，自然就會有人去鋪軌道，自然而然一般的醫療工作者就會走在軌道上。

這本書所寫的牙科預防醫學也有一條軌道可循，而軌道的源頭是一個權威性的組織，那就是世界衛生組織。一般人看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來的牙科預防醫學綱



領，只會讓人覺得很空洞，不知道有甚麼實質的意義存在，但是這些綱領一旦經過學術機關的研討或者牙科相關企業的點石成金以後，就會化身成爲和生活息息相關的具體內容。

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不論蛀牙還是牙周病都是經由傳染而來的。蛀牙和牙周病就像不小心傳染到感冒一樣，都不是與天俱來而是由外界傳染而來。不同之處在於感冒的病菌可以經由身體的免疫力將之消除，而蛀牙和牙周病的病菌卻是揮之不去。

所以大家都養成和蛀牙以及牙周病共生的習慣，反正治也治不好，反正死也死不了，反正大家都有不是只有我。也因此很少人去思考如何減少互相傳染的機會，也很少人去思考治療方法可以和感冒一樣從病菌下手，而不是只用外科的手法來改善症狀。

誰都知道感冒是可以預防也可以吃藥治療的，天氣一有變化都會聽到有人提醒：

『要小心不要得到感冒噢！』

你一得到感冒，立刻有人關心：

時代的另類檔案

序 《時間的重量》

◎野夫

讀罷汪建輝兄的短篇合集，許久未敢置一詞。

面對一個同時代人的文本，幾乎是第一次有了失語的驚惶。我甚至無法確定，這些文字究竟應該如何界定其體裁。小說？散文？抑或哲學隨筆？毫無疑問，他在講故事——這些幾乎是用真名真姓的灰色人物，用極端詭異的事結構，用十分形而上的題目，所建構的一種奇異文學，顯然是這個時代流行文本的一個另類。

現代漢語的新小說實驗，始自於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郁達夫先生所創造的一種獨特的文學形象——畸零者，我似乎在建輝兄的筆下，重見了這一邊緣人物的當代版。又或者說，卡夫卡式的虛構和象徵，所呈現的彼代生活的荒誕與荒謬，又在我們所處的此代畸形盛世復活。無論時光如何流轉，這些代復一代的被莫名審判、欺侮和扭曲變形的城堡中人，一直在我們身邊穿過著……

二

建輝兄似乎一直在默默進行這種文本實驗。他正是這樣畸零於網路時代的喧嘩碼字之外，自絕於浮華社會油腔滑調的所謂現世安穩。他和他的文字，都像遠古深山中的某個煉丹師，在甚囂塵上的市聲背後，獨自秘密地調製著他救世或自救的配方。

他是先於我的「自由寫作獎」的得主，如果沒有獨立中文筆會的這一表彰，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悄然存在。他在鮮衣花容的成都，始終隱身於八九一代的傷口之中，負劍獨立，夜半嘯哀，文字和其人一樣不與人群。

在僅有的幾次晤對中，建輝兄都是寡言少語的落寞如一段稿木。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酒筵歌席的樽邊，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蕭然不知塵世的過往冠蓋。我能認出我們那一代人的胎記——那幾乎是與生俱來的憤世和

厭世，都深刻在我們的骨節中。無論生與死，都無法焚盡我們心腔的記事纏結。

三

我非學術中人，我無法具體解讀他筆下的人物和他的事結構。但我熟知那些本真的人物和故事，我時常會在沉重的閱讀中會心一笑，辨認出此代人的特有尷尬和無奈。

當現世的奇絕荒誕和殘酷，遠超乎人類的任何虛構之時，所謂文學，很多時候是在替代史學的缺位。屠戮不絕的民間寫作者，在官修正史和誥命辭賦之外，爲這個無恥的時代刮毒療傷，爲苟延殘喘的民魂在存心立命。

也因此，這樣的寫作必是沉重且寂寞的。一如華族遠祖的那些孤僧野道，行走在自己給自己授命的荒途中，因首蓬面地刻劃著心底的符咒。我始終相信，文字誕生之初的使命，是作為符咒出現的。故而其神秘魔幻的美，以及力量，都依舊暗含著咒語的奇效。

建輝兄的文字，正承載著這樣的使命——他一撇一捺的刻劃，都在編織著現世的裏屍布。在當代官制藝文的背後，正是這樣一些孤高的歌吟者，爲後世留存著這個時代的另類檔案。當那些淫聲技巧的倡優文藝，身與名俱滅之後，我堅信凸現在後人眼中的，必是這樣的文本；子孫們必將在這些字縫中，追索出此世的真實世相。

我實在不知道從技術流的角度，該怎樣評價建輝兄的成就。他的幾種著述，都不能見容於我們的祖國，而不得不付梓於海外。這些稀世孤音，遠勝於國中那些盛名橫流的歌者。生活未能給我足夠的機緣，去瞭解他的身世現況。因此，只能就我浮光掠影的閱讀印象，向這個世界的同道中人推介。

謹此，乞諒于建輝兄，以及有緣知遇的讀者。

『趕快去看醫生，要好好吃藥噢！』

像感冒這種小病大家都小心萬分，可是會影響一輩子生活型態的蛀牙和牙周病倒是大多數人都掉以輕心。理由很簡單，因為感冒會小病變大病。

蛀牙是小病嗎？小蛀牙還好，如果蛀到無法咬東西，那就是大病。

牙周病是小病嗎？牙周病是大病！牙周病會引起心肌梗塞、老人肺炎、骨質疏鬆、早產兒，會加重糖尿病。這些與生老病死息息相關的疾病，如果說有一部份原因是來自牙周病，牙周病當然是大病。

『真的嗎？我怎麼沒聽見過牙周病是百病之源？』沒聽過並不奇怪，因為能夠確認牙周菌和這些疾病的因果關係，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事情了。基因學者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送給全世界的禮物，就是美國總統柯林頓很驕傲地向全世界宣布：

『人類的基因地圖已經畫出來了！』

有了基因地圖，才能夠正確的解析出從病巢採取的病原原來是牙周病菌。

而當病菌學界認識了牙周病的嚴重性以後，這十年

來便有一門新的科學產生，叫做「牙周內科」。「牙周內科」是專門研究預防牙周病菌進入體內以及針對牙周病菌治療牙周病的學問。

將來有一天，治療牙周病的方法可能變成這樣：

『醫生，最近得了牙周病請給我開個藥方。』

『好，你要喝牛奶還是要吃雞蛋？』

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事先將改造牙周菌基因的藥劑投入牛或雞的體內，令所產的牛奶或雞蛋含有預防牙周病疫苗的方法。

這本書主要想傳達的就是這些最新的牙科預防醫學概念，而這些概念所依據的是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來的綱領。有了概念以後，本書更進一步的利用這些概念提出一些具體的牙科預防醫學方法。

『零下一歲開始刷牙』，這個書名乍看之下也許有點耐人尋味，然而如果讀畢全書，一定會讓自己以及身邊的小寶寶能夠減少許多口腔內甚至全身疾病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未來媽媽或者初為人母媽媽如果能夠早一點開始實行書中所說的重點，只要好好照顧小寶寶到三歲為止，甚至有可能會讓小寶寶一生免於蛀牙的痛苦。

月光何以奏鳴？

◎廖志峰

你的靈魂是一幅精選的風景 魏崧

當我對著一沓書稿卻怎麼也琢磨不出理想的書名時，忽然想起月光。

說起月光，第一時間在心中湧起的旋律，究竟是柔情如水的德布西？還是情感澎湃激動的貝多芬？我彷彿在二種情感之間擺盪，時而低迴，時而激昂。對於兩首舉世聞名的古典名曲，ZOE說：貝多芬的〈月光〉是挑戰技巧與音樂的曲目；德布西的〈月光〉則是當技巧與音樂完整之後，必需再加上以文學與美術為內涵的超越，他們的作品是音樂史上的兩大突破點。行家解題，果然當行出色。據說貝多芬的〈月光〉原是要獻給他心儀的女子，難怪曲調先是掩抑而後澎湃；而德布西的〈月光〉則是以法國最重要的象徵派詩人魏爾倫的詩所譜寫的曲，充滿了印象派的甜美抒情，到今日仍是世人耳熟能詳的樂曲，經常出現在古典音樂會，電影，或廣告影片中，成爲最貼近俗世生活的樂章。

幾年前到巴黎參觀書展，買了法國繪本大師桑貝的新作《音樂家》，排隊等候簽名，終於見到了桑貝本尊，他知道我是出版同行，在書的扉頁上，用原子筆畫了一幅月光下的薩克斯風手。月光真是神來之筆，像是一種召喚。月光射進屋內，灑落庭園，映照在池塘、海邊或鐵皮屋頂上，那冷清的銀輝，總透著難以說清的氛圍，讓人沉吟。就在這個夏天即將結束，秋天尚未到來之際，我們出版了一本原本無以爲題而終以月光爲名的書，《月光，奏鳴》。我曾以爲，在爲ZOE出版了《世界太美麗》之後，我可能無法再和她合作出版第二本書。聽到這樣的說詞，包括作者本人，都很吃驚。我的理由也許滑稽，但我覺得《世界太美麗》已是一本美麗的書，很難再去超越這本書帶給讀者的印象——如果書名已是「世界太美麗」，那美麗之後，還會是甚麼？我因此想讓這樣的美麗印象停格。

然而，世事難料，終究還是爲ZOE做了第二本書。五年中，ZOE累積了更豐富的人生閱歷，寫下更多深具繆思的文章，以文字爲織梭，把音樂家的軼聞，樂曲背後的故事，人生真實的體驗，自己的感悟，藉音樂爲引，編織出一幅幅動人的浮世繪。藝術，音樂，文學，在人世之間穿梭交錯，真實生活因此有了超現實的色彩，和美麗的想像，讓我們可以隔著一二百年的時空帷幕，與當世或曾存在的人，同悲同喜。沒有預期地讀到如許感人的小故事，讓人難以釋卷，即使是不具古典音樂背景的讀者也能欣然悟入，在

閱讀中，打開心靈的內室。

ZOE的文思活潑俏皮，你跟著她的文字自由穿行世界，像是音樂靈動。閱讀的進行中，彷彿有一種即興的節奏，像我最喜歡的新爵士樂鋼琴家喬治·溫斯頓的作品〈夏日〉，輕快的琴音流洩，如月光下歡快的溪流，時有水花飛濺。一段愉悅的旅程。它雖不若純文學的凝重，但卻藉由輕巧的文字來提升心靈視野，重要的是，作品中所透露和提供的訊息，能帶給讀者許多的觸發。名家輩出的時代，寫作的文風筆法本有多種，有的緊湊，有的徐緩，有的繁複花俏，有的枯瘠瘦硬，各有所向。然而ZOE的文字帶給人的感覺卻是灑脫靈動，她鬆開了文章緻密的緊箍，用一種怡悅自在的聲調來宣敘，自然而不造作。我隨著她的敘述，出入她的故事間，經由這些故事，看見一個五感俱存的世界。

在這個五感世界中，蕭邦遇見喬治·桑，爲他短短人生中掀起更大的情海波瀾；柴可夫斯基與他的長期贊助者梅克夫人終身未見，令人悵悵；與史特拉汶斯基的熱戀，香奈兒推出她的第一瓶香水，香奈兒五號，成爲時尚經典；晚年逐漸失明的畫家馬諦斯，開始學小提琴，延續對生命的熱愛；世界第一男高音帕華洛帝過世，喪禮在他小時後唱聖歌的教堂舉行，當他的靈柩從教堂移出時，播放著正是他生前所唱的《天使聖體》

——這也是帕華洛帝此生所唱的第一首歌，美國公共電視以「七首詠嘆調，一個人一生」的紀錄片來追悼他。人生，以音樂始，以音樂終。這些故事，讓人一再低迴……

音樂具有不可知的能量，能撫平哀傷，也能喚起一種精神意志，在電影《阿蒙與橡樹》，片中有一段敘述主角西蒙初次進入音樂廳的場景，對正在演奏的古典音樂，他的反應十分激動，好像喚醒了內心深處的渴望。因爲對古典音樂的外行，我不知那段音樂到底意味著什麼，後經ZOE告訴我，才知那一段音樂是法國作曲家白遼士《幻想交響曲——一位藝術家的成長》的第一樂章，標題是「夢幻熱情」，電影最後那段家人親友歡聚的背景配樂，標題則是「舞會」。原來，導演早已藉音樂再一次告訴觀眾電影的主題。音樂是一種密碼樂曲，與人生同步開展。

通過音樂認識的世界，何其純粹而美麗。藉由《月光，奏鳴》，我也有了不同看待人生的目光。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存在著一種獨一無二的風景，月光如鳴，喚醒我們心靈最深處的感知。



一年一會，歡喜相見

2013第二十一屆台北國際書展

• 展覽地點：
台北世貿展覽一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5號）

• 本館位置：
B區S16

• 展覽時間：
2013年1月30日（三）10:00-18:00（限專業人士入場）
1月31日（四）10:00-18:00
2月1-2日（五~六）10:00-22:00
2月3日（日）10:00-20:00
2月4日（一）10:00-18:00

